

1980年

优秀短篇小说欣赏

百花集勝

526
百 花 集 胜

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欣赏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28 19⁶/₁₄印张 插页 2 387千字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6,000 册

书号: 10113·216 定价: 1.54 元

且作前言

蒋守谦

假如把1980年我国的文学比做一个“姹紫嫣红开遍”的大花园，那么可以说，这一年的短篇小说，就是这个大花园里百花集胜，色彩如虹，千姿百态的花丛。

我们之所以将这本书名曰“百花集胜”，乃是因为，这一年的短篇小说之“花”，据有关方面统计，至少在三千“朵”以上，实在令人目不暇接。根据“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的道理，我们选择了十七篇曾经深深打动过自己的优秀篇章，从不同角度加以品评，和读者共同欣赏，这大概也是一种不无益处的工作吧！

为欣赏和分析方便计，这里先对这一年的短篇创作做一个鸟瞰式的介绍，且作本书前言吧。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的短篇小说创作一马当先，始终保持着不衰的势头，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在生活的磨砺与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可观的作家阵容。同新中国一道起步的中年作家们，大都走过一段坎坷的人生道路，他们的思想比较成熟，并且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生活素材和艺术经验。如今，随着文学和人

民的解放，真正跨进了列宁所说的文学创作的“广阔天地”，成了我国当前文学创作的中流砥柱。他们的作品一出，往往就显得较有分量，引人注目。比如徐怀中的《西线无战事》、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李国文的《月食》、王蒙的《春之声》、张贤亮的《灵与肉》、陆文夫的《小贩世家》、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玛拉沁夫的《活佛的故事》、茹志鹃的《儿女情》、邓友梅的《双猫图》等等。这些作品，题材、人物、主题、形式是那样鲜明地反映着作家的个性，表达着人民的心声和时代前进的步伐。有探索、有创造、有突破；歌颂、暴露、憧憬浑为一体，得心应手。体现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批判极左思潮，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日益繁荣兴旺的光辉景象。春潮花汛也激起了许多老作家的创作冲动。他们驾轻就熟、老当益壮。马烽同志的《结婚现场会》，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有重要的突破；冰心老人的《空巢》洋溢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激情；汪增祺的《受戒》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使我国1980年社会主义新文苑呈现出老树奇葩耀眼明的喜人景象。尤其令人兴奋的是，1980年的短篇小说创作，继续保持了前几年那种新人辈出，新作泉涌的发展趋势。不仅是前几年已经崭露头角的新人，如蒋子龙、刘富道、周克芹、张抗抗、叶文玲等，在这一年中又有了新的建树，获得作品奖；而且，在这一批得奖作者当中，象何士光、柯云路、锦云、王毅、李斌奎、张林、陈建功、罗旋、韩少功、张石山、方南江、李荃、京夫、王群生、益希卓玛、吕雷、王润滋等，几乎都是在这一年以其脱颖而出的新作，才为人们所瞩目的。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写过几篇作品，到了1980年，一举登上了惹人注目的艺术

台阶；有些人，比如《三千万》的作者柯云路，《最后一个军礼》的作者方南江、李荃等，则是以其处女作而第一次显示出其思想上的敏锐和艺术上的才能的。这些文学界的新人，他们扎根于基层，沐浴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的阳光雨露，得天独厚，大有希望。有这一大批老、中、青作家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旗帜下放声歌唱，用时代的强音鼓舞人民，迎来了短篇小说创作的又一个丰收年。

1980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有以下显著特色。

革命现实主义在深化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的短篇小说，和整个文学创作一起，迅速地回到了革命现实主义道路上来。我们看到，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当有些人还在吞吞吐吐、左顾右盼的时候，《班主任》、《伤痕》、《神圣的使命》等率先破土而出，通过对宋宝琦、谢惠敏、王晓华、王公伯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的刻画，以无可辩驳的艺术力量，揭示了这场所谓“革命”，不过是在我国青少年一代的心灵上、在我们整个国家的肌体上，留下累累“伤痕”的一场浩劫，给极左思潮以猛烈一击。其后，《剪辑错了的故事》、《黑旗》、《李顺大造屋》、《记忆》等反映“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生活的作品问世，一举揭露了“十七年”中那些曾经被颠倒了或被掩盖着的是非曲直，挖掘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历史渊源，把文学创作上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向前又推进了一步。与此同时，作家们那犀利的笔触，纷纷伸向现实生活之中。一方面，创作了象《乔厂长上任记》、《信任》、《战士通过雷区》等作品，讴歌了建设“四化”，

保卫“四化”的新英雄人物；一方面创作了《悠悠寸草心》、《草原上的小路》等作品，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人们所普遍关注而又亟待克服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等阻碍“四化”胜利进军的消极现象。而《足迹》、《湘江一夜》、《我们的军长》等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在这几年的出现，则表现了我国人民对逝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切怀念，鼓舞人民群众学习他们的光辉榜样，把他们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这些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作品的不断涌现，有力地说明了我国短篇小说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在冲破了所谓“感伤主义”、“缺德”之类的舆论阻挠之后，确实是得到了恢复和发扬光大。

那么，到了1980年，短篇小说革命现实主义的步伐前进到哪里了呢？我觉得，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其一，是作家们在真实地表现生活中矛盾斗争的原有基础上，更注意了对短篇小说题材上的某些薄弱环节的开拓。前一两年，人们在欢呼短篇小说创作的丰收时，也曾不无遗憾地指出，农村生活和部队生活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这不只是一个作品数量多少的问题。它说明了我们作家对这两个重要生活领域的矛盾斗争还缺乏足够的艺术上敏锐的洞察和概括能力。列夫·托尔斯泰说：“艺术的事业在于探求作品的焦点，并把这些焦点历历在目地展列出来。这些焦点，根据旧的划分，乃是人的性格，但是，这些焦点也可以是场景、民族、自然的性格……。”（1857年《札记》）这里的所谓“焦点”，实际上就是被作家深刻感受、理解和表现出来的生活中的具体而又典型的矛盾斗争。作家们的努力，使这种艺术上的“焦点”，在1980年农村和部队生活题材的短篇小说中，终于“历历在目地展列出来”了。你看

《乡场上》(何士光)、《陈奂生上城》(高晓声)、《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结婚现场会》(马烽)、《上李村》(王吉星、张子良)、《绿色的山岗》(成一)、《落选》、《勿忘草》(周克芹)、《笨人王老大》(锦云、王毅)、《竹叶子》(莫应丰)、《牺牲》(张一弓),等等,把各个时期,特别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各种各样的矛盾,把各个阶层农民和干部的心理状态,表现得是多么真实、丰富而又发人深思。作家们在歌颂党的新的农村政策,但他们不是枯燥无味地图解政策,而是根据自己深刻的生活感受,创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表现不同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农民思想、品格、命运的深刻影响。冯幺爸在“乡场上”对一句公道话是说还是不说的矛盾心理状态,陈奂生住进招待所以后那种从感激到惊疑到后悔到恼火的感情变化过程,荒妹和荣树的爱情之所以避免了存妮和小豹子那种悲剧下场……,所有这一切都莫不凝聚着新旧交替时期我国农村生活的具体特点,闪耀着批判极左思潮、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锋芒。在以往出现的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中,农村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斗争、农民沉重的精神负担,不能说没有受到作家的关注,但是究竟怎么表现和解决那些矛盾,往往就显得比较迟疑或难以按照自己的真实观感说话了。党中央在农村实行经济改革的方针及其卓有成效的贯彻,使作家们的思想豁然开朗,他们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现实了。因而,生活中的许多矛盾,也就得到了比较真切地表现和令人信服地解决。所谓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化,正是表现在这里。今年获奖的部队生活题材的作品,恰恰也在如何准确地把握部队新时期生活方面,有了重要的突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作品都没有回避部队和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乃至正面

人物心灵上的伤痕或他们内心世界的矛盾、苦恼。由于作家们找到了消除阴暗面、医治伤痕、克服矛盾的途径，因而他们也就敢于大胆面对现实，放手地描写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应该描写的矛盾斗争。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徐怀中笔下的刘毛妹身上，我们看到，他那种为祖国英勇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是来自别的方面的原因，恰恰就是他感到那个曾给他带来苦难童年的祖国大地上的魔影，已经被驱除，并且需要进一步驱除；他要誓死保卫这样一个正处在振兴过程中的伟大祖国；他心灵上的伤痕，也就是在这场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得到了有效地疗治的（《西线轶事》）。从李斌奎笔下的郑志桐形象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悬在空中的英雄思想和英雄道路。郑志桐是在十年浩劫和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存在着混乱思想的特定环境里，通过自己的认真思考和辛勤探索，带着自己的欢乐和苦恼，向着自己所认定的报效祖国的崇高的人生目标，坚定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天山深处的“大兵”》）。摆在刚刚取下帽徽、领章转业指导员耿志面前一些青年战士的无政府主义行为，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引起了这个已经不在其位、失去了运用组织纪律手段进行工作的共产党员的不满和苦恼，同时，也正是因为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这是他在此时此地仅可运用、也是最根本、最有效的手段——来教育战士，影响他人。他的崇高的精神境界，一下子就呈现到了读者的眼前（《最后一个军礼》）。这样一些作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说明我们的作家在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又踏上了一个新的里程，短篇小说对时代生活的反映，来得更加全面、广泛了。

其二，是人物趋于更加多样化。从这一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既看到了象郑志桐、丁猛、耿志、高山兰等

这样一些走在新长征队伍最前列的有血有肉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也看到了象张安邦（《三千万》）、罗二娘（《乡场上》）、郁秃子（《扬花似雪》）之类作为“四化”事业破坏力量的反面人物形象。而许灵均、伊汝、亚女、杨思萍、冯么爸、王老大、竹叶子等等，则是一些以自己独特的性格、情绪、命运，表现了社会生活某些本质方面和微妙变化的普通人形象。一般说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大概也就是这样三种类型。复杂丰富的社会生活，在这三类人物形象中也的确都得到了有声有色的反映。但是从一个具体的作家来说，往往存在着写某一种类型的人物比较顺手，而难以在自己的人物画廊中造成千姿百态的景象。蒋子龙就曾经这样地反躬自问过：“根据我的情况，是不是只能写一些‘乔厂长’之类的人？”（蒋子龙：《关于“日记”的断想》，《小说选刊》1980年第2期）实际上，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人物类型的问题，它反映了一个作家有没有能力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问题。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蒋子龙在1980年写出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和《人事厂长》。虽然写的也还都是“厂长”，但是这两篇小说中的厂长金凤池和高盛五，同敢想敢干、雷厉风行的乔厂长不同了。特别是金凤池，他要办好工厂、为工人谋利益，但又困难重重；他讨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但又没有勇气与之斗争；他对自己那种随波逐流、从隙缝里讨生活的“滑头”行为也深感不满，但又难以立即改弦易辙。这种极其矛盾的心理状态，正是当今社会生活中复杂的矛盾斗争的一种反映。从他那本意不愿而又不得不为的苦恼中，我们看到了要真正搞好“四化”建设，彻底扫荡社会上那种毒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正之风，是多么必要。这是一种情况。再一种情况，

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下,为一些犯错误的好人画像。比如《竹叶青》里的农村青年干部张树基,本来被乡亲们视为建设家乡的栋梁之材,但是他当上了干部以后,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乱批乱斗,六亲不认,闹得鸡犬不宁。显然,作者所要鞭挞的并不是他,而是毒害了他的那条极左路线;对他有辛辣的嘲讽,但却也含着同情的泪水。又如《西望茅草地》里的老场长张种田,其人格是无可指责的。身为“大跃进”时期茅草地农场场长的他,身先士卒、全力以赴而又不假思索地贯彻了那些来自上级的左的方针,他所干的那些错事、蠢事,固然反映了他的弱点,更反映着他作为一个工农干部的革命品格,他那急切地希望改变祖国贫穷面貌的热烈心愿。如果说,张树基犯错误有令人同情的一面的话,那么,张种田犯错误,就有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这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作者塑造这个人物时是寄寓着深意的,那就是:我们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审慎地看待这个人物身上的一切,看待历史。简单化地否定一切,图一时痛快,那是不可能从中吸取痛切的教训而有益于来者的。我们说1980年短篇小说中的人物更加多样化了,指的就是金凤池、张树基、张种田这样一些人物的出现。你既不能把他们归入英雄人物或反面人物的类型之中,也难以把他们归入含义较广的“普通人”这个类型之中。这是作家从生活的更深处发掘出来的具有新的特色的艺术形象。六十年代初期,邵荃麟同志鉴于当时文学创作现实主义精神不足的情势,把“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作为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同时提出,是很有见地的。所谓“写中间人物”,实质上就是要打破人物形象上的单一化倾向,搞多样化,为作家开拓出一条观察、反映社会生活复杂性和丰富性的宽阔的艺术途径。

坚持人物形象的多样化，是为了促进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化。1980年短篇小说人物创造上的更加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同样不也是表明革命现实主义深化了么？！

其三，在这一年短篇小说创作中，作家们比以前更加着力于对人的命运和心灵的描写，特别是着力于对劳动人民的心灵美的深入开掘，借以阐发富有重大现实意义而又鼓舞人心的主题。为什么伊汝在遭受了二十二年的磨难之后，对我们党恢复、发扬和劳动人民之间那种被严重破坏了的血肉关系充满了信心呢？为什么他把我们党和国家所经历的长达二十多年之久、令人极其痛心的历史曲折当作一次转瞬即逝的“月食”，我们非但不是觉得他过于轻率，反而觉得确有见地呢？根本问题，就在于李国文同志在《月食》这篇内容丰厚的作品里，有力地表现了象郭大娘、妞妞这样一些普通劳动者对党、对革命所具有的那种比大地还要宽厚的胸怀。说起来，毕部长对在战争年代曾把他从死尸堆里救出来、全国解放后又经常背着家乡土特产进城去看望他，竟然遭到他的冷遇，实在也够令人痛心的了。但是郭大娘没有过分地计较这些，反而津津乐道于他当年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历史，他们之间那象母子一样亲密的关系。毕部长因“右倾”被贬谪到边疆改造之后，郭大娘更是挂念在心，主动用自己的棺材钱接济他的生活，祝愿他和伊汝早日度过难关。这样的情怀，是何等淳朴，而又何等可贵！再从伊汝和妞妞在爱情上的悲欢离合来看：妞妞所表现出来的那一往深情，她对伊汝的等待，是爱情的坚贞更是一个劳动妇女在自己和国家处在非常状态的时候，对生活、对前途所抱的那种坚强不拔的信念和度过难关能力的生动写照。正是中国劳动人民的这种最宝贵的品德，使我们不能不有理由高瞻远瞩地来看待往

日出现在党和他们之间那一层乌云。特别是在党今天拿出“诚心”来改正自己的失误，决心恢复、发扬自己的光荣传统的时候，我们更有理由相信那一层乌云必定很快就会被拂去，党和人民那更加亲密的关系，将象“月食”后重现的皎洁的明月一样，高悬在万里晴空！《灵与肉》里的那位与伊汝有着相似遭遇的许灵均，其所以会毅然决然地抛弃跟随父亲出国去接受那份巨大的财产、过西方那种所谓现代化的阔绰生活，决心留在西北高原上参加祖国“四化”建设，同样也是因为那里劳动人民淳朴、善良的美德，深深地感召了他。象“郭喻子”，老牧人、特别是他那位连一张邮票也没有用便出奇不意来到他身边，同他共命运的妻子秀芝，都是在他受尽屈辱、悲观绝望的时刻，同情、理解、帮助过他，使他获得了生活勇气的人。他生活在这样的人民中间，就象一棵树把生命的根须深深地扎在沃土里，离开这沃土，他的生命也就枯竭了。这是何等深切的生活感受、何等真实、炽烈的爱国热情啊！我觉得《月食》和《灵与肉》在1980年出现，鲜明地反映了我们的文学创作已经从揭露伤痕、呼吁医治伤痕，而发展到有力地表现出我们民族肌体上那足以能够平复伤痕的最宝贵的内在生命力。这实在是作家经过深入思考之后在创作上所取得的一个重要突破。此外，还有许多描写劳动人民心灵美、给人以深刻启示的优秀之作。比如《笨人王老大》、《心香》、《扬花似雪》里的主人公，他（她）们生活的不幸或爱情悲剧，都发生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岁月，善良的灵魂被“左”得出奇的恶势力蹂躏了。对美好前程的憧憬被严酷的现实击碎了，于是触目惊心的悲剧也就发生了。读这些作品，你将会痛切地感到：要重新召回那些消失了的善良的灵魂，要把人们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

美好憧憬付诸实现，非彻底清除那个打着“最革命”旗号而又给革命带来最严重破坏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不可！作家在对劳动人民美好心灵的热烈歌颂中来揭批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他们所给予读者的思想力量和审美感受，比起单纯揭露、批判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来，显然要深沉、积极得多了。

如果上述三点不失荒谬的话，那么，应该说1980年的短篇小说在前几年已经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它的革命现实主义是更加深化了。

形式和艺术手法的竞相创新

1980年，短篇小说作家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的竞相创新，将作为我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载入史册。

这种竞相大胆创新的现象，不是偶然出现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的潮流澎湃于全中国。文学作品从内容上要求广泛、真实、深刻地反映我们丰富多采的，旋律与节奏都比以往更紧张急促的社会生活，原封不动地搬用旧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作品的需要。那么，要求在形式、手法上突破、创新，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1979年，王蒙的《夜的眼》和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这两个短篇一问世，人们耳目为之一新，议论纷纷：国外的“意识流”被引进中国文学创作中来了！到了1980年，各地文艺刊物上不断出现所谓“意识流”小说，成为许多作家竞相创新的一种大胆尝试。其中有得有失，不可一概视之。单就王蒙的《春之声》、《海

的梦》、《风筝飘带》等三个短篇来看，作者显然是企图通过人物那处于变幻着的复杂的心理状态，来反映现实生活中既洋溢着“春的声息”，又存在着“冬的痕迹”这样一种新旧交替的变化过程。现状与历史、写实与想象、歌颂与暴露，水乳般地交融在一起，给人一种光怪陆离之感。传统的形式和手法被打破了，采用多线条的放射结构，靠联想组织素材，某些象征手法的运用，着重描写人物的心理变化等等，显然都是从外国文学、包括现代派作品中借鉴来的。但是作品使用的文学语言，又是经过提炼了的地道的北京话。如果语言是文学民族形式的“第一标志”这个命题还能成立的话，你不能说王蒙的这些作品离开了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只是还不成熟罢了。这样写的好处是比较精练，内涵比较丰富，也比较耐人寻味。这样写，还避免了那种或者只歌颂生活中的光明面，而不见阴暗面，或者只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而不见光明面的偏颇。历史发展的大动向，在作者把两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描写中，得到了比较有力地揭示。当然，这样写也有弊病，用王蒙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头绪比较乱，乍一看令人不知所云”（《关于〈春之声〉的通信》，《小说选刊》1980年第1期）。这个不可等闲视之的弊病如何克服、能否克服，这种形式能不能最后成为群众所公认的、我国短篇小说的一种新颖独创的民族形式，那还要靠作家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去努力探索，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和群众的选择。

此外，应该看到，1980年短篇小说在形式和艺术手法的创新方面，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情况。比如，张雄辉的《心理危机》（《作品》1980年第11期）就吸收了外国推理小说的手法；乔浮沉的《月眉》（《安徽文学》

1980年第8期)又大胆地运用象征主义手法;李准的《芒果》(《人民文学》1980年第10期)颇似国外流行的“黑色幽默”作品;王希坚的《李有才之死》(《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续赵树理名著《李有才板话》,虽属偶一为之,却也饶有风味,如此等等。这些作品的影响虽不及《春之声》等广大,但是作为一种尝试,一种探索,其意义也不可忽略。

还应该看到,在1980年出现的大量作品中,看上去虽然基本上保持了“五四”以来我国短篇小说的格局,实际上也都有所变化、有所创新。象《月食》、《心香》、《灵与肉》、《扬花似雪》、《天山深处的“大兵”》等作品,它们的时间跨度一般都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久,但是作者都不是用从头说起,一一道来的方式,搞成一本编年史式的东西,而是抓住人物命运转折关头的某个特定的契机,向纵深展开,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历史和现实都经过作者的精心剪裁,融化在人物思想活动的规定情景之中,造成一种作品的内在逻辑和现实的时空顺序大致上相协调的局面。这形式和手法,同过去人们常说的倒叙、插叙或艺术结构上的单线展开、复线交叉进行等等,已不尽相同,显然也是吸收了国外现代派艺术手法上的某些长处而又不露痕迹所致。再如《陈奂生上城》、《乡场上》,比较多地继承了我们传统艺术中那种通过动作、语言、气氛来刻画人物的手法,看起来比较“土”,实际上也是寓“洋”于“土”之中的。所谓“洋”,就是作者都在倾其全力地来展示人物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并通过人物那种复杂的心理变化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复杂的矛盾斗争的进程。但是这些作品的确不象国外现代派作品那样完全冲破时空顺序,完全转向内心描写,而是基本上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逻辑来组织素

材，结构故事的。这类作品在当前似乎更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毫无疑问，短篇小说的创新，和其他各种文学样式一样，都应该在继承我们自己优秀的民族文艺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步伐可以有大小，但结果都应该是更加民族化、群众化。完全背离民族传统、不顾广大读者欣赏习惯的东西，是没有前途的。现在，作家们还都处于探索阶段，尝试阶段，相信他们是能够根据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不断总结经验，经过辛勤的努力，兴利除弊，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新颖独特的艺术形式的。

开展正常的批评，贯彻“二为”方向

在1980年出现的短篇小说中，那些思想和艺术上都堪称上乘的作品，虽然只占三千余篇作品的一小部分，但是却代表着我国短篇小说创作所达到的新水平，新成就。比较多的，是思想和艺术上也都有某些可取之处，但是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深，一般化的作品，有待作者进一步去提高。也有一些有争议、或者思想、艺术倾向存在明显问题因而受到公开批评的作品。有争议的作品不一定是坏的作品，但其中确也有些经过争论，证明其思想或艺术上有问题，属于不好、或不够好的作品之列。这一批不好或不够好的作品，在数量上虽然有限，但它们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作家是否真正扎根于生活的沃土之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反映生活、评价生活的问题，是坚持革命现实主义道路还

是背弃革命现实主义道路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创作也就是作家以艺术的方式探求生活真理的活动。被作家描写在文学作品中的生活，无论它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都必须是真实的，是读者所曾经经历过、可能经历过或将会经历的。艺术的规律，不允许作家把一个什么现成的结论图解一番，塞给读者，而只能是作家和读者一起神游于作品所提供的生活环境之中，作家凭借他高尚的思想情操和犀利的笔墨，揭示、剖析其中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矛盾斗争，指出它的发展趋向，表示正确的臧否，给读者以启示和鼓舞。但是，出现在这一年中那些思想和艺术倾向不良的作品却不是这样。它们当中那些离奇怪诞的故事情节，一看就可以断定是作者生编硬造出来的。诸如：“四人帮”时期的一个害眼病的公安局长如何指使某医学教授到刑场上去为自己挖换死刑“犯人”的眼睛，那眼睛又如何变成“一对喷射着烈焰的火球”的描写；林立果选的“妃子”跳崖自杀。一个“摄影记者”如何“怕她掉下来，又盼着她掉下来；如果掉下来，刚好让我接在怀里，我敢趁势吻她一下”的描写；一群红卫兵徒步长征，被山野猎人截获，强配夫妻，长达十年无人知晓，而当其中一个女青年的父母乘坐直升飞机前往寻找，她竟因为同“丈夫”有了感情而拒绝归返的奇闻；一个学校里的驼背花工，为了营救被“四人帮”爪牙追逐的农村姑娘，竟同她结为假夫妻，让她在家里读书启蒙、解放个性，爱她真正所爱的“生活里的强者”——一个实际上以挖墙脚为能事的高干子弟的臆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殊不知，当作者热衷于编造这类离奇怪诞的故